

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及其對中國
生命倫理學的理论挑戰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and Its
Theoretical Challenges to
Chinese Bioethics

李紅文

Li Hongwen

Abstract

This commentary reviews the article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which critiqu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MBE) from philosophical and

李紅文，湖南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長沙，郵編：410208。
Li Hongwen,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China, 410208.

基金專案：2024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4BZX101）：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構建研究。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年)：頁51–5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51–55.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The original text argues that MBE relies on an untenable neuroessentialist reductionism, overlooking the embodied, embedded, and culturally mediated nature of human morality. This commentary emphasises the article's significance for bioethics in China, where rapid bio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alls for nuanced ethical reflection. By integrating Confucian perspectives with contemporary "4E" cognition theory, the article provides a culturally resonant framework that resists simplistic moral enhancement proposals and promote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moral development.

《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一文，從哲學、認知科學與進化生物學等多維視角，對道德生物增強（Moral Bioenhancement, MBE）倡議進行了系統性質疑。該文指出，MBE 依賴於一種被稱為神經本質主義的極端還原論，錯誤地將道德行為簡化為大腦神經機制的可調控輸出。作者通過引入 4E 認知理論——即認知的具身性、嵌入性、延展性與生成性——有力地論證了道德理解與判斷不能脫離身體、環境與文化背景而獨立存在。這一批判不僅具有國際前沿性，也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當代建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與反思路徑。

一、對神經本質主義的深刻批判：超越還原論的思維範式

該文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首要貢獻，在於其提供了一種超越簡化還原論的理論工具。在中國，隨著基因編輯、腦機介面與人工智慧等技術的迅猛發展，公共討論與部分政策制定容易陷入一種“技術解決主義”的陷阱——即認為複雜的社會與倫理問題可以通過直接的技術干預得以修復。MBE 正是這種思維的典型體現：它假設道德缺陷如同維生素缺乏症，可以通過“道德維生素”（如催產素、特定基因編輯）來補充。

該文通過剖析“成癮”的腦部疾病模型與社會心理模型，精彩地揭示了神經本質主義的局限。文章指出，即便將成癮完全歸因於大腦病變，也未必能減少社會污名，反而可能讓患者和醫生

對康復持悲觀態度，忽視了改變社會環境的關鍵作用。這一分析對於中國語境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例如，在討論網癮、青少年心理問題或社會信任危機時，如果簡單地訴諸於神經診斷或生物干預，而忽視其背後的家庭關係、教育壓力、社會結構等複雜因素，無異於緣木求魚。該文提醒我們，生命倫理學必須堅持一種整體論和系統論的視角，將人視為活生生的、處於複雜社會關係網路中的具身主體，而非一堆等待優化的神經元。

二、儒家思想與 4E 認知的匯通：構建中國特色的倫理話語

該文最具獨創性的見解之一，在於其點明了 4E 認知理論與儒家傳統之間的親和性。作者指出，儒家傳統中的主要思想資源可以被解釋為當今 4E 認知理論的雛形。這一洞見為構建具有中國文化根基的生命倫理學打開了新的空間。

儒家哲學自始至終都強調“身心合一”與“知行合一”。從孔子的“仁者愛人”需要“克己復禮”的身體實踐，到孟子以“惻隱之心”等具身反應作為仁義的端倪，再到《大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遞進式倫理實踐，無不表明儒家的“成人”之道是一個嵌入於具體家庭與社會關係、延展於日常行為禮儀、並生成於持續不斷的學習與修養的過程。這與 4E 認知理論將心智視為源於腦-身-環境動態互動的觀點高度契合。

因此，當 MBE 倡議試圖繞過道德理解和情境敏感性的培養，直接“安裝”道德行為時，它不僅在科學上是天真的，在哲學上也與儒家所宣導的“由禮入仁”、“積善成德”的倫理路徑背道而馳。這啟示中國生命倫理學研究者，可以主動地從儒家、道家等豐富的傳統思想資源中汲取養分，與西方批判理論進行對話，從而在全球性的技術倫理辯論中，發出獨特而有力的中國聲音。

三、對中國特色科技倫理治理的啟示：從原則到實踐的深化

在實踐層面，該文為中國正在不斷完善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提供了深刻的哲學警示。中國的科技倫理強調以人為本、公平公正和風險可控。該文的論證為這些原則注入了更具體的內涵。

首先，在以人為本方面，文章警示我們，“人”的本質不能被簡化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腦。尊重人的尊嚴，就意味著要尊重其道德成長的完整性、自主性與開放性。任何試圖通過生物技術來預設或強制統一道德標準的做法，都可能構成對人性尊嚴的根本性侵犯。這要求我們的倫理審查不能僅僅關注技術的物理安全性，更要評估其對人的道德主體性、文化認同與社會關係的潛在侵蝕。

其次，在公平公正方面，文章揭示了一個嚴峻的風險：MBE技術可能不僅無法普適性地提升全人類的道德水準，反而可能加劇社會不公與分裂。例如，催產素可能強化“圈內偏愛”，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成為新的社會分層工具，製造出生物學意義上的“道德精英”與“道德底層”。這提醒政策制定者，在推動科技發展時，必須將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維度前置，警惕技術可能帶來的新型歧視與不平等。

最後，該文呼籲一種審慎與謙遜的技術發展觀。人類道德是在漫長的生物與文化協同進化中形成的複雜系統，我們對它的理解遠未完備。在這種狀態下，對道德本身的增強工程，其風險遠大於對軀體疾病的治療。

總之，這篇論文是一面映照中國生命倫理學自身發展與挑戰的鏡子。它為我們提供了批判性的思想武器。它啟示我們：道德的真正增強，不在於我們能否用技術控制大腦，而在於我們是否能在科技文明的浪潮中，依然守護並培育那種基於理解、共情與智慧的人類道德本身。中國生命倫理學若能在此基礎上，融匯古

今、貫通中西，必將能為全球科技倫理的健康發展貢獻獨特的智慧和力量。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李紅文：《道家生命倫理的傳統視域與現代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Li, Hongwen. 2020.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徐向東：〈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7-34。Xu, Xiangdong. 2025.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7-34.
- Churchland, Patricia. 2011. *Braintrust: What Neuroscience Tells Us about Mor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Shaun. 2005.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sson, Ingmar, and Julian Savulescu. 2012. *Unfit for the Future: The Need for Moral Enhanc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